

多国解密档案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例

戴超武

近年来学界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以及研究者对这些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是密不可分的。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度关系的研究,极典型地诠释了多国解密档案对学术创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系统整理中国、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并基于这些档案的解读和运用,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度关系的发展演进,特别是中印两国围绕西藏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斗争,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进程及其影响,由此赋予中印关系史研究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前沿性和创新性。这一研究的前沿性和创新性,有利于分析和解释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以及对这些目标的判定和维护,有利于总结中国领导人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经验,有利于比较和辨析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基本模式与政策实施的特点和差异,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之权利主张的学术支持。同时,多国解密档案在中印关系史研究中的运用,还有利于回应和批判印度多数研究者和国际学界在有关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所存在的流传甚广的谬误。这样的努力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一 与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相关的多国解密档案

中国的解密档案,主要是来自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所藏的台湾外事部门的档案。其中,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对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研究最具价值。这些档案虽基本属于外交部所生成的文件,但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部在中国决策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外交部档案馆同时也收藏了其他核心及重要部门的文件,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对外贸易部、中央调查部等部门的文件。从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可较为系统地了解 and 认识中国对印度政策的变化、对边界争端的态度、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中国对亚非国家调停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国搜集边疆史地文献与中印边界勘查等重要问题。以下卷宗包括了上述重要事件和政策决策的档案(按卷宗号顺序):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书籍、地图搜集和整理(102 卷宗);中国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政治经济关系(105 卷宗);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之后对印度战俘的处理(105 卷宗);有关亚非国家调停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中国对亚非国家调停的反应(107 卷宗、108 卷宗);中苏两党两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109 卷宗);英国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110 卷宗);中国领导人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应及对策(111 卷宗);处理中国历史地图关于边界的画法(114 卷宗);中印两国官员会谈的档案(116 卷宗);外交部领事司档案、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报告、西藏外事处报告电文以及西藏外事处各分处的报告电文、新疆外事处报告电文(118 卷宗);中国领导人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外国领导人会谈记录以及往来通讯、周恩来总理 1960 年同达赖喇嘛的谈话(203 卷宗、204 卷宗)。这些档案有助于对冷战时期中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战略选择及其经验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

印度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已出版的《尼赫鲁选集》第二系列、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和收藏印度外交部档案的印度国家档案馆。已出版的《尼赫鲁选集》(第二系列)收录了尼赫鲁有关中印关系的文献,特别是对中印边界及对西藏的政策。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收藏了这一时期参与印度对华外交政策以及中印边界问题决策的重要人物和官员的文件,包括:杜德文件(Subimal Dutt Papers, 1956—1960 年担任外事秘书),考尔文件(T.N. Kaul Papers, 1958—1960 年任驻伊朗大使, 1962—1966 年任驻苏大使, 1966—1968 年任外事秘书);

梅农文件(K.P.S.Menon Papers,1947—1952年任外事秘书,1952—1961年任驻苏联大使);拉·库·尼赫鲁文件(R.K.Nehru Papers,1952—1955年任外交秘书;1955—1958年任驻华大使,1961—1962年任外事秘书长),等等。印度外交部的档案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抗议英印政府加强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活动;印度政府在1948—1950年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武器弹药的档案;印度驻锡金政治官员有关西藏、不丹、锡金的报告;印度同西藏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印度驻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地商务代理处的周报、月报和年度报告等等。这些档案文献揭示了尼赫鲁时期印度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实施以及影响,其中大量档案涉及尼赫鲁的对华政策、对印度邻国的政策、同美苏等大国的关系、不结盟政策的缘起和变化、印度国防现代化等重大政策和事件。

在英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特别是FO 371系列卷宗和DO 133系列卷宗,均收录了大量有关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献资料。英国外交档案的利用,主要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意义的关键问题展开,例如,英国对“麦克马洪线”实质的认识;英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后对印度国防现代化的支持;英国对中印关系发展趋向的评估等;英国对第二次印巴战争的反应等等。美国的档案文献主要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中央情报局档案、杜鲁门总统图书馆、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等,也包括已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系列文件集中的相关文献。从这些档案中,可按美国对南亚地区特别是对印度政策的演变;美国对华政策与对西藏地区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对西藏政策中的作用;与印度的经济关系;美国对“麦克马洪线”政策的变化及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选择;对印度的军事援助等专题,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探讨。值得提出的是,美国解密档案显示,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美国虽开始向印度提供军援,但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印度抵抗中国进一步的进攻,而非帮助印度收复在中国发动自卫反击作战以后所“丧失的领土”。

俄罗斯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这些档案揭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揭示了苏联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加大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对印度的军事支持。其中,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保存以下重要的档案:苏联外交部1959—1960年致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苏联驻印度大使的电报;1959年7月—11月及1962年1—10月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大使(临时代办、武官),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国防部长、印度总统的会谈纪要;与印度外交部其他领导人就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举行的会谈纪要(全宗090)。当代文献保管中心的重要档案包括:苏共中央关于1959年西藏局势以及西藏与印度的关系的报告(全宗5)。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的重要档案包括:1959年12月底葛罗米柯准备的伏罗希洛夫等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全宗5);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1日和14日关于中印关系的第58号和第59号会议记录(全宗3);1962年10月苏共中央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给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迪克托夫的指示(全宗3)。

二 多国解密档案对中印关系研究的价值

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的研究,以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到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的重大事件为重点,其中又以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为主线,在对各国解密档案资料整理翻译与互相印证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新的研究,或发掘以往忽视的重大问题,或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或批驳被歪曲的事实,由此把握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

多国解密档案对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第一,突出了中国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以此扭转中国学界以往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缺少档案文献利用的弱势,从而使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研究具有更强的档案基础。国内学术界近年来虽有不少中印关系的著作出版,但无一利用多国档案进行研究(相关论文除外),特别是根本没有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可以预见的是,国内学界在未来的研究中,如再继续使用二手论著而不依据业已解密的多国档案,那不仅毫无创新,更将招致国际学界特别是印度学者的无情嘲笑。

第二,多国解密档案的利用,将使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取得突破和创新。依据多国新近解密的档案,在涉及中印关系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注重借鉴和使用国际史的方

法,进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在研究视角上,将有关国家具体的外交政策同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系起来。以边界争端为例,利用多国档案文献资料,把中印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决策及对外行为置于多边关系的互动和冷战国际体系之中加以考察,探讨大国政治和国际因素对中印两国对外行为的影响,深入考察和比较中印两国国内因素的影响,从而阐释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中印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更为重要的是围绕领土争端所显示的两国决策者之国际战略思想的差异、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利用,开拓了有关中印关系史的重大问题的新研究。这些新研究的对象是指那些影响中印关系演变、此前在缺乏档案文献的情况下鲜有探讨的重要个案,在国内外学界均属研究的前沿领域;对这些个案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有关中印关系史的结构,另一方面更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印关系演变的动因,特别是围绕边界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以致走向战争的诸多深层次的因素。

基于多国解密档案,中国外交有关对印度的战略以及对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包括了以下新的研究内容: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基本政策;中国对“麦克马洪线”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史料准备和勘测工作;印度对西藏的禁运和贸易管制与中国的反应和对策;西藏外事处在中央制定对西藏地区政策中的作用;中国对苏联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战斗机的态度;科伦坡会议六国的调停与亚非其他国家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对亚非国家调停的政策。通过印度的档案文献,得以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印度政府所确定的其对华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和途径,特别是这一战略的贯彻执行对中印关系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这些重大问题的叙述包括:尼赫鲁政府一再坚持的划定边界的水岭原则的意义;在独立初期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土地并实施行政管理的政策措施;尼赫鲁在内部反复表明西藏在历史上并非是“独立国家”的考虑(而非印度公开坚持的中国仅仅拥有所谓的“宗主权”);印度独立之初对待边疆地区的战略与国防建设;1950—1959年尼赫鲁之西藏政策中对边界问题的考虑;印度为中方转运粮食到西藏的基本考虑;印度在联合国“朝鲜停战委员会”中的作用和向中方索取相关费用的交涉;尼赫鲁在不同时期对“前进政策”的态度的变化;尼赫鲁拒绝就边界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战略意图;印度购买英国、苏联、加拿大等国军火的谈判;印度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启动。

第四,在上述重要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野,诠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重构有关中印边界争端之缘起、发展及其影响的叙事。在这一叙事中,重点阐述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中国国内政治、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的互动,分析中国处理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的战略决策,以及这些变化和关系的互动如何影响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构想、理论和实践。

具体而言,中国领导人制定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战略,其出发点首先考虑的是要团结以尼赫鲁政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国家,从而为新中国在两个阵营之外寻求更多的盟友,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同时,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充分权衡了西藏同内地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交通状况;中共中央在解放军进藏之初暂不解决边界问题的决策,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内地同西藏交通困难的严重制约。而这种同印度关系的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变化,从1958年开始,日益受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和国家关系恶化的影响。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印度的支持,特别是军事上的支持,是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对“不结盟国家”在新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亚非其他民族主义国家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及其政策立场,是决定中国领导人重新考虑并加以判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尼赫鲁时期印度对华政策而言,通过基于多国档案的研究,可阐释这一时期印度采取对华友好政策的真正目的;尼赫鲁政府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处理同中国西藏地区的经贸关系之时,其战略考虑都是力图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如对西藏实施贸易禁运、同中国谈判废除印度在西藏特权等问题,以达到使其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合法化之目的。利用多国解密档案,可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实质。

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以及冲突过程中的政策表明,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在冷战中所面临的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和实用性。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外交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

外交。所谓的“更倾向于西方的中立”服务于尼赫鲁的两个战略目标：大国战略和国家安全。具体到中印边界问题上，尼赫鲁希望同时保持与美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来实现其既定目标。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向肯尼迪总统请求军援，而冲突期间和苏联的往来也表明，印度清楚地意识到中苏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并加以利用。印度在边界冲突后在更加倒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同时，大力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对印度而言，不结盟和中立的政策已丧失原有的表面上的意义。同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印度视中国为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其显著的变化就是对核武器的态度，由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政策转向发展和掌握核武器，以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在印度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美、英、加等国）和苏联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五，多国解密档案丰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基于已有的解密档案，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系统研究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同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演变之间的关系；分析国际体系的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总结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同时，依据中国档案，还有助于探讨中国外交部如何参与中央决策、如何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外交部同其他决策部门之间如何合作和协调等。

第六，中国同印度之间的领土争端，不仅是冷战时期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当前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上看，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西南地区战略边疆的安全，关系到中国同印度的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同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前途，而且对中国稳定西藏地区的局势、遏制和打击“藏独”势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中印两国已就边界问题建立起政府间的谈判及会商机制，但边界问题如要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前景并不乐观。究其根源，除印度对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实际占领外，还同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其错误的历史观，部分印度学者继续在其研究中论证此种历史观的“正确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英国档案显示，作为宗主国和“麦克马洪线”的炮制者，英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划定所谓“印藏边界”的分水岭原则，也仅仅体现在“麦克马洪线”的西段的一部分。这些档案充分说明，自尼赫鲁以来的印度历届政府所提出的中印边界东段是以分水岭原则而划定的一贯论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同时英国档案还证实，中国比印度拥有更多的历史证据，来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范围。这些档案文献自然而然地批驳了某些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相关论点。因此，基于多国解密档案所揭示的尼赫鲁时期之印度政策的实质，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还原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真相。

三 多国解密档案的运用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

基于多国解密档案的中印关系史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印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动因，以及这种演变对中印两国的安全战略以及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多国解密档案的有关中印关系的历史研究，同样有助于深化对有关当代国际关系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其一，有关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领土争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最为重要的根源。冷战时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演变显示，边界问题，特别是西南地区的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显然是突出的；但同日益出现的边界争端相比，中国更为关注的是，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同邻国的边界争端，并在20世纪60年代陆续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在处理同印度的边界争端中，中国同样是主张以谈判加以解决，并提出相应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以军事手段迫使印度同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是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论战过程中力图向赫鲁晓夫证明中共理论正确性所采取的重大步骤。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尼赫鲁视领土为国家核心利益，并以错误的历史观为指导，坚持对争议地区的主张，拒绝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

其二，联盟战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冷战的两极体系中，联盟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无可替代的

作用,而共同或相近的意识形态,则是组建联盟的国家进行相互选择的一个基本标准。因此一般而言,处于重大危机和(或)战争之中的国家,总会主动寻求盟友的支持和帮助,而盟友总会在不同程度上提供这样的支持和帮助,或起码予以道义上的声援。中国档案、印度档案以及俄罗斯档案显示,中印边界冲突在中苏分裂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印边界争端的过程中,苏联在表示“中立”的同时,却在经济上、军事上乃至政治上大力支持印度,特别是出售先进的米格战斗机,这无疑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极大愤怒,对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冲击。而美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向印度提供大量军援,完全不顾其军事盟国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美国的政策正是导致巴基斯坦大力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关键因素。中苏分裂、美巴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度同苏联关系的发展至少说明,意识形态并非是联盟政治的关键推动力之一。

其三,双边关系的演变与国际体系的变迁。印度同苏联、美国关系的发展,同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美关系的敌对和危机,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印度外交决策者利用这些变动,争取到美苏对其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力支持,而这种支持也成为印度在处理同中国边界问题时采取强硬政策的决定性的动因之一。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升温的同时,苏联也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印关系的发展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对中国的西南边疆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严重的威胁。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从而也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暴露了印度军力的弱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的欲望,其结果是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这次战争的后果导致苏联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以致纵容和支持印度在1972年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因此,冷战时期围绕着中印关系所产生的双边关系的变动和演变,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体系所出现的重大变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基于多国解密档案的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研究,展示了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趋向,那就是在文献源上努力以多国档案作为支撑,借鉴国际史的方法,注重并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和课题选择方面,更多注重与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有密切关联的重大事件,深入探讨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样的成果,既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历史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2017-03-31

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41。

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

徐国琦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就其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说,顾名思义当属“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及“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范畴。因为这部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参与(无论是正面抑或负面)的历史,深受国际和国内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尽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遍观国内外近现代中外关系史著作,似乎很少有人从科学角度通过“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的视野来研究。几年前我曾先后就方法论问题发表过文章,呼吁史学界重视两个方法的重要性(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第5~15页。徐国琦:《试论〈共享的历史〉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27~39页)。近来通过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我又有些新想法和见解,本文就“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作为史